



中国减贫经验分享研究¹

侯军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摘要：贫困是困扰人类上千年的难题，自 20 世纪初期开始为了消除贫困，中外学术界对贫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贫困并不是单一维度主导的结果，贫困问题涉及个体或家庭的资产、抗风险能力、心智维度、可行性能力以及心理等多个方面，所以任何仅仅靠单一维度的贫困观所实施的反贫困决策都是不充分的。因此，应认真研究致贫的复杂原因，结合国家或区域资源禀赋、社会制度、顶层设计、减贫模式等，是推动全球减贫事业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关键词：减贫经验；减贫智慧；中国故事；案例分享；国际贡献；

一、中国减贫与中国减贫贡献

（一）中国的减贫历史回顾

中国减贫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减贫阶段（1949—1977 年）。该阶段主要的减贫成就：完成土地制度改革，确立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建立农村财产公有制，初步建立以社区五保制度和农村特困人口救济为主的农村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2）体制主导的扶贫开发阶段（1978—1985 年）。改革开放开始，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转变为以“包干到户”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逐步缩小，农村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3）解决温饱的扶贫开发阶段（1986—2000 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中国组建了国家级的扶贫

¹ 本报告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委托项目“中国精准扶贫经验的国际分享与应用”课题成果之一，王天衡根据课题承担单位提供的研究报告编辑而成。报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单位，出台相应政策，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原有的临时性救济扶贫转变为区域式扶贫，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将“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单列一章，划定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一批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并提出以区域开发带动扶贫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4）巩固温饱的扶贫开发阶段（2001—2010年）。该时期将开发式扶贫战略的精度提高，把贫困瞄准重心由县下移到村，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5万个贫困村，以村为单位实施扶贫开发战略，全面实施以整村推进为重点的扶贫开发措施。（5）建设全面小康的扶贫开发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新的扶贫目标和扶贫战略，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脱贫标准不断提高，脱贫人口不断增加，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时期扶贫体系已经成熟，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9，比1956年下降了0.64。

（二）、中国减贫贡献

1、国内贡献

（1）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分东、中、西三大区域看，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147万人，比上年减少153万人；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597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916万人，比上年减少718万人。

（2）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得到促进。我国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战略为农村地区注入新活力，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得到稳步提高，农林牧渔总产值从2014年的97822.51亿元提升到2018年的113579.5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在从2012年的44845.7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61452.60亿元，产业发展的同时农业农村经济得到一定的提高。

（3）国家经济显著增长。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同时贫困情况的改善和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按照1978年的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09.5亿元，与此同时，随着GDP的上涨，贫困发生率明显降低，从1978年的97.5%降低为2018年的1.7%。

2、国际贡献

中国的减贫工作对于世界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贫困发生率

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8年的1.7%，在50年间下降了95.8%，成为了世界减贫事业走在前列的国家，为整个世界减贫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二是中国在减贫过程当中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总结出了一系列经验，可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并对发展经济学以及减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事实论证，为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吸引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关官员不远万里前来取经。2016年10月，来自马拉维、加纳、肯尼亚等15个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官员来到北京，参加“2016年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二、中国减贫经验形成的背景

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贫困斗争的历史。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长河中，实践着自己脱贫的思路和想法，凝结了许多脱贫的智慧。

（一）国内扶贫开发冲刺阶段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贫困地区的各个方面包括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道德水平等均有很大的提升，同时，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情况的改变与新矛盾新问题的产生，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不少新问题、新困难与新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全面脱贫，当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中国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仍面临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第一，部分地区需要加快脱贫进程才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特别是新疆（南疆三地州）和山西的脱贫攻坚任务完成难度大，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源和人力。第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全国14个贫困省区中，西藏、四川省藏区、南疆三地州、吕梁山区、六盘山区、乌蒙山区和滇西边境山区7个片区的贫困率极高，“三区三州”（西藏、四省藏区、南疆三地州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贫困人口大量存在，这些地区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全国和区域内其他地区，贫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较低，收入贫困与教育、健康、住房等

非收入贫困并存，脱贫攻坚需要与民族、宗教和边境安全等复杂问题协调起来解决。第三，低收入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返贫压力上升。受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我国农村低收入人群增长在最近几年明显增长乏力，产生了较大的返贫压力。

（二）全球化进程中贫困问题突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些问题和挑战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表现更加突出。比如贫困问题，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反而因为经济全球化，国内的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慢、金融市场波动以及气候变化日益增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世界上还有 8 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伴随着贫困的是饥饿，疾病甚至社会冲突的不断发生，全球贫困治理充满艰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贫困问题更具复杂性。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导致各种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脱贫过程更加艰难。其次，很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由于城乡二次元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巨大，贫富的巨大差距使得 6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不断出现政治危机和社会冲突。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背景变迁下产生的，贫困的特点大体上呈现出一些相似性：第一，就业率低、失业率高。尤其以拉丁美洲等国家为代表，上个世纪 90 年代，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几乎超过 10%，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贫困的大面积发生。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就业的不稳定以及较低的收入对贫困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上个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就业的不稳定和较低的收入使得大规模的人群陷入贫困。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严重。在全球范围内，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平等化程度相对较高，非洲发展中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导致了人口的贫困。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急需富有实践性的反贫困经验来借鉴学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贫困问题上有许多相似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所探索和积累的发展促进减贫事业、开发式扶贫以及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做法及经验，不仅对本国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也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三、中国减贫思想与减贫方案

（一）中国减贫思想

自 1949 年至今，中国在扶贫攻坚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满足新时代提出的减贫要求，中国的减贫思想不断演进，减贫对象从“普惠式”到“特惠式”演进，减贫方式从“输血式”到“造血式”的演变，扶贫主体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演进，在我国思想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当前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精准扶贫思想，并以此思想为基础，开展“五个一批”等减贫措施，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减贫事业持续发展。

1、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

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2、精准扶贫的精准原则

（1）扶贫对象精准。自 2014 年 4 月开始，通过总体指标控制和社区民主评议的方式，政府在农村进行建档立卡，识别出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又通过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6 月开展的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和剔除一部分贫困人口，前所未有地实现了扶持对象的精准。

（2）项目安排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要求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就需要在精准识别阶段摸清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对症下药，安排差异化的扶持项目。

（3）资金使用精准。国家为加强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这些文件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了扶贫资金使用的精准度。

（4）措施到户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要解决的是政府扶贫开发过程中扶贫措施不到户、单一化等不精准的问题，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以来，中央出台的每个具体文件中都体现了“到户到人”、“分类施策”的基本要求。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要求措施到户精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5) 因村派人精准。针对扶贫开发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的问题，2015年4月至今，全国共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切实提高了基层组织贫困治理的能力。

(6) 脱贫成效精准。针对扶贫开发过程中扶贫成效不明确、脱贫退出不精准的问题，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提出要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分级负责、坚持规范操作、坚持正向激励的原则，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3、精准脱贫的核心内容

精准脱贫的核心内容聚焦于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这四个问题上。第一，“扶持谁”问题。关于扶持谁，就是要做到对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变“大水漫灌”的“普惠式”扶贫为“精准滴灌”的“特惠式”扶贫。第二，“谁来扶”问题。随着我国减贫方式的演变，扶贫的主体逐渐开始朝着多元化发展。对于精准扶贫来说，帮扶涉及到的帮扶主体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第三，“怎么扶”问题。解决怎么扶问题，首先，在项目落地方面要做到近期脱贫与长远致富相结合。其次，在资金使用方面要做到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投入与产出相结合、监督与管理相结合。最后，在措施到户方面要强化相关举措的实效，“做到结对帮扶促和谐、教育培训拔穷根、危房改造改穷貌”。第四，“如何退”问题。解决“如何退”问题的关键在“三大机制”中，健全考核机制是实现扶贫脱贫的制度保障，退出机制是扶贫脱贫有序化和精准性的基础，第三方评估机制则是扶贫脱贫的公平性和认知度的保障，可大大增强扶贫脱贫的公信力和诚信度。

(二) 中国减贫方案

1、注重领导体系的核心作用

中国的减贫事业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减贫的坚强政治意愿。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致力于领导全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减贫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2、构建中央统筹、省总负责、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

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脱贫攻坚工作负总责，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政策措施，根

据脱贫目标任务制定省级脱贫攻坚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市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协调跨县扶贫项目，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管理、脱贫目标任务完成等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监督。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对贫困村、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和精准退出情况进行考核和检查，加强政策宣传，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脱贫攻坚措施落实到户到人。

3、“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开发工作格局

扶贫开发事业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中国政府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开发工作格局。专项扶贫主要是国家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由扶贫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扶贫项目；行业扶贫主要是农业、水利、交通、住建、教育、卫生等行政部门按照职能分工，承担相应的扶贫任务；社会扶贫是指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事业之中。

4、中国减贫方案的工作机制

精准扶贫机制是以实现精准脱贫解困为目的，以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化扶持，进而实现自我发展为内容，是扶贫过程中各种机制要素，即精准识别机制、精准帮扶机制、精准管理机制以及精准考核机制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之中，各个具体的机制组成部分，有着相互联系，但又有明确功能分属的关系。

四、中国减贫经验与智慧

(一) 中国的宏观减贫经验

1、依托中国的行政体系建立了自上而下完整的扶贫开发机构

中国的扶贫开发按照行政体系实行分级负责，中国政府依托行政体系建立了自上而下完整的扶贫开发机构，以政府为主导高效开展减贫行动。在中央政府成立由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组成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扶贫开发机构，统一领导和协调本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

2、通过土地改革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完成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制度建立，实现了农村土地的平均分配，解决了土地私有制导致的土地集中问题。改革开放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所有农户都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农户可以自主经营并获得

土地产出的绝大部分收益。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习近平指出创造性地从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结合上，提出要解决好“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关系，进而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等一系列减贫构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的不断深入，减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并提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供给制度、城乡医疗救助等制度建立健全是中国从底线消除贫困的重要制度创新。

4、将减贫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布局

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家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增长，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物质基础。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始终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为重要目标。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三个中长期扶贫规划，明确地提出了到 2020 年中国扶贫开发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组织保证、可选择的扶贫模式、资金来源、帮扶措施、退出机制和监督考评等。

（二）中国的微观减贫经验

1、创新可供选择的形式多样的减贫模式

中国政府在扶贫工作的推动过程中，结合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索出一系列扶贫的新模式，如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易地搬迁扶贫、东西协作扶贫、定点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生态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旅游扶贫、光电扶贫、资产收益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等。时代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扶贫模式也随之不断创新，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继续拓展的必然要求。

2、贫困评定标准的多维化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 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都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标准，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这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多维贫困标准目标。“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体现了对于贫困的主观认识和衡量，由简单的收入等经济指标转变为经济、教育、健康、医疗、住房等多维指标；就社会制度而言，“三保障”的目标充分体现了给予贫困人口公平均等的享有权利的机会，避免由于地域、经济、民族、信息等原因造成的权利贫困。

3、开发式扶贫取代救济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通过利用贫困地区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以解决温饱、脱贫致富。开发式扶贫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可持续产业培育、开发、成长和壮大，从而达到贫困人口实现就业保障、收入可持续。第二，开发式扶贫注重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发展，强调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第三，开发式扶贫更加注重区域环境改善和致病因素的消除。

4、分层、分类编织与逐步完善的社会减贫保障体系

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实施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工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三大制度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目前，农村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着最基础的兜底扶贫作用，其中社会救助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着最直接的兜底作用，社会保险制度发挥的作用则不断在扩大，而社会福利制度的兜底扶贫作用相对较弱。

（三）中国减贫智慧

1、中国减贫智慧具有哲学性

在消除贫困的意义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包含了消除贫困。我们发展经济，为全国人民创造充足的社会财富，让他们摆脱贫困，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落实到贫困人口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都得到保障，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扶贫目标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让我们的扶贫工作有了可量化的目标。在消除贫困的方法上，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发展是消除贫困最直接的方法的观点，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总办法的论断。提出贫困最终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中国减贫智慧倡导共享观念

在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谈到，共同发展的核心是解决人们最直接和最

现实的利益。提高和分享公共服务能力，实施扶贫项目、提高教育质量、义务教育、就业和创业，推动均衡发展。贫困问题就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农村地区最现实的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除贫困的历史性突破，在许多方面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牢记共享发展理念，为世界共享减贫经验，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更是将减贫经验“走出去”，与世界各国共同交流和分享，致力于全球的减贫工作，贡献“中国智慧”。

3、中国减贫智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精准扶贫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更大的扶贫力度和更精准的扶贫措施，集中全党全社会力量，发挥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来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精准扶贫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才能开拓脱贫攻坚的新格局，完成历史使命。首先，精准扶贫是为了农村贫困群众美好生活而提出的。在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当今中国，仍有少数贫困人口陷入绝对贫困之中。在党和政府继续领导组织扶贫工作，为全民的共同富裕而努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进入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为人民奔向更好的生活而奋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党的要求。精准扶贫的任务是实现精准脱贫，并且只有每一个中国人都顺利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才是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开始。其次，精准脱贫需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需要大力扶持的对象，更是需要主动作为的脱贫主体。习近平多次强调发挥其内生动力，物质脱贫还需先从改变贫困思想和意识开始，因此扶贫要先扶志，扶智与扶志相结合。内因起决定作用，只有贫困人口有了改变和摆脱贫困的意识和勇气，才有可能通过实际行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因此，精准扶贫的全过程包括脱贫成效的检验，都需要贫困人口积极有效地参与。

五、中国减贫经验与智慧分享建议

（一）中国宏观减贫经验与智慧分享建议

1、政府主导，构建中国宏观减贫智慧与经验分享体系

政府在推进中国减贫智慧与经验分享和推广，政府构建宏观减贫智慧与经验分享体系时需注意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顶层设计，即按照一定的分享与推广目标，遵循对外分享与推广的规律，制定出台分享与推广方案，确保中国宏观减贫智慧与经验的系统

性和前瞻性。其次是统筹协调，统筹好各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统筹经济交往、政治对话、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分享中国经验的路径，形成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层次分明、内容互补、导向一致的中国宏观减贫智慧与经验分享体系。

2、通过国际会议分享中国宏观减贫经验与智慧

举办或参与减贫与发展类的国际会议也是传播中国宏观减贫理念和经验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举办国际或区域性会议交流中国宏观减贫智慧与经验；二是出席和参加国际或区域性会议传播中国宏观减贫智慧与经验。通过专业性的减贫国际会议或是相关的其他会议，中国的参会代表将中国的减贫智慧与经验进行有效宣传。

3、通过大众媒体促进中国宏观减贫经验与智慧的传播

中国宏观减贫智慧与经验的分享要依靠传播媒体的国际化，首先要加快推动中国减贫信息包括研究报告、网络信息、书籍和电子版会议资料等内容的翻译工作，依托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内著名高校及国际研究机构建立起统一、稳定的对外宣传话语体系，保持政府口径的一致，形成一个声音讲话的局面。其次，要积极运用他国大众传媒，通过直接与外国媒体交流有意识地影响他国媒体的报道向中国减贫案例倾向，进而影响中国宏观减贫经验对外国民众和政府的吸引力。

（二）中国微观减贫经验与智慧分享建议

1、企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项目，传播中国微观减贫经验与智慧

政府需要在企业“走出去”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优势，建立全国范围内企业参与扶贫援助的机制。在实施我国与发展中国家扶贫援助项目过程中，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将企业的海外社会责任与国家的减贫交流合作有机的结合起来，鼓励企业参与和承接各类扶贫援外项目建设。

2、民间组织参与，完善中国微观减贫经验与智慧分享体系

就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可以将民间组织细分为官办民间组织、半官办民间组织和民办民间组织。官办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促进中国微观减贫智慧与经验分享体系的构建。官办民间组织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具备了较强的获取信息和促进国际交流的能力，从而能够有力地推动国家间的扶贫经验交流和扶贫项目合作。民办民间组织涉及的扶贫领域最为广泛，最具有灵活性，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直接对话、个人游说等诸多倡议活动来分享和应用中国微观减贫智慧与经验，

弥补了政府宣传推广的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是政府宣传的有效补充。

3、智库引领，完善中国微观减贫经验与智慧的分享思路

智库又称思想库，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一方面，智库积极引进国际减贫智库资源，借鉴国外优秀减贫经验。比如邀请国际反贫困专家参与中国减贫工作，组织外国专家进入贫困地区调研，参与减贫方案制定。另一方面，中国在“精准扶贫”中积累的经验也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等方式，借助智库力量，向国外推广，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参考文献

[1] 白描. 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中国精准扶贫进展与前瞻研讨会综述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4.

[2] 陈昕. 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 [J]. 价值工程, 2010(28):23-35.

[3] 程晓娟, 全春光. 基于 AHP 的农村致贫因素研究 [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0(3):21-25.

[4] 杜毅. 我国农村贫困致因研究综述 [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6(4):52-56.

[5] 董秀荣. 农村致贫因素研究 [J]. 科技资讯, 2006(13):182 - 183.

[6] 范小建. 60年：扶贫开发的攻坚战 [J]. 求是, 2009(20):31-34.

[7] 郭熙保, 周强.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J]. 经济研究, 2016(06): 143 - 156.

[8] 黄承伟等. 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 [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5(1): 132-136.

[9] 黄承伟等. “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2):42-50.

[10] 黄承伟. 习近平扶贫思想体系及其丰富内涵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6): 36-41.

[11] 黄承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总结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7(5):5-16.

[12] 黄承伟.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33(5).

[13] 黄承伟, 袁泉. 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02).

[14] 黄承伟. 深化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7(04).

[15] 胡兵, 赖景生, 胡宝娣.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05):33 - 42.

[16] 胡联等. 贫困的形成机理：一个分析框架的探讨因素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2): 36-42.

[17] 胡联, 王唤明, 王艳, 汪三贵. 政治关联与扶贫项目瞄准 [J]. 财经研究, 2017, 43(09).

[18] 蒋永穆, 周宇晗. 习近平扶贫思想述论 [J]. 理论学刊, 2015, (11).

[19] 姜安印, 张庆国. 中国减贫经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鉴性 [J]. 中国流通经济, 2016, 30(4).

[20] 李向阳. 广东“双到”扶贫模式的示范意义 [J]. 开放导报, 2015, (4):111.

[21] 李小云, 唐丽霞. 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5): 33-38.

[22] 李小云等. 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家化的讨论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5).

[23] 李小云, 左亭.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挑战与对策 [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08).

[24] 李小云, 肖瑾. 新南南合作的兴起：中国作为路径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2017(5): 1-12

[25] 李小云, 张悦, 刘文勇. 知识和技术的嵌入与遭遇：中国援助实践叙事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11):1-8.

[26] 廖冰等. 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带致贫因素分析 [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3(2): 249-256.

[27] 林雪霏.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 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J]. 重庆社会科学, 2014(9): 23-29.

[28] 罗楚亮.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 [J]. 经济研究, 2012, (02): 15-27.

[29] 刘义圣, 许彩玲. 习近平反贫困思想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借鉴 [J]. 东南学术, 2016(2).

[30] 刘学敏. 精准脱贫考核评估机制的关键议题 [J]. 改革, 2017, 284(10).

[31] 陆汉文. 贫困退出机制完善的有效途径 [J]. 改革, 2017, 10.

[32] 陆益龙. 精准有效社会扶贫机制的构建路径 [J]. 改革, 2017, 284(10).

[33] 彭红碧. 中国农村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1): 399-401.

[34] 秦良芳, 陈卓, 游昭妮.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J]. 社会科学动态, 2019(2): 40-47.

[35] 孙文久, 唐泽地. 中国产业扶贫模式演变及其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借鉴意义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4(06).

[36] 唐丽霞. 精准扶贫机制的实现—基于各地的政策实践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1): 158-162.

[37] 吴芳, 尹德志. 系统论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解读 [J]. 世界农业, 2015(2): 39-45.

[38] 万广华, 张茵.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06(06): 112-123.

[39] 汪三贵等.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5(5): 147-153.

[40] 汪三贵, 曾小溪. 后 2020 贫困问题初探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02).

[41] 汪仁洁. 金融扶贫机制创新的四个维度 [J]. 改革, 2017, 10.

[42] 王美艳. 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4(09): 3-16.

[43] 王先山, 徐少炜. 精准扶贫研究综述 [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18(1): 107-111.

[44] 王晓毅, 黄承伟. 深化精准扶贫, 完善贫困治理机制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4).

[45] 谢君君. 教育扶贫研究述评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2(3): 6-10.

[46] 邢成举, 李小云. 超越结构与行动: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经验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1): 32-47.

[47] 杨骅骝, 周绍杰, 胡鞍钢. 中国式扶贫: 实践、成就、经验与展望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6): 138-142.

[48] 杨颖.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 21 世纪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新挑战——基于 2002—2007 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08): 12-18.

[49] 张梦旭.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减贫经验值得分享 [N]. 人民日报, 2016-4-13.

[50] 张琦, 冯丹萌. 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 1978—2016 年 [J]. 改革, 2016(4).

[51] 章元, 万广华, 史清华. 暂时性贫困与慢性贫困的度量、分解和决定因素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3(04): 119-129.

[52] 庄天慧等. 精准扶贫主体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139-145.

[53] 袁方, 史清华, 卓建伟. 农民工福利贫困按功能性活动的变动分解: 以上海为例 [J]. 中国软科学, 2014(07): 40-59.

[54] 左停. 乡土资源、知识体系与精准脱贫的内源扶贫机制 [J]. 改革, 2017, 284(10).

[55] 曾志红, 曾福生. 我国农村致贫的社会制度分析 [J]. 农业经济, 2013(11): 33-35.

[56] 曾小溪, 汪三贵.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经验: 基于扶贫战略和政策的历

史考察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54(06).

[57] 中共国务院扶贫办党组. 创造人类反贫困历史的中国奇迹——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扶贫工作的重大成就与经验 [N]. 求是, 2018(18).

[58] 周文, 冯文韬. 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减贫实践的中国贡献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9(2):12-18.

[59] Gao Jing, Wu Bihu.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 China [J]. 2017(63):223-233.

[60] Golan Jennifer, Sicular Terry, Umapathi Nithin.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 China: Who Benefits from the Rural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Guarantee (Dibao) Program? [J]. World Development, 2017(93):316-336.

[61] Kunze Lars. Funded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s Letters, 2012(2): 180-183.

[62]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J]. Manchester School, 2010, 22(2) : 139-191.

[63] Lowder Sarah K., Bertini Raffaele, Croppenstedt André. Poverty, social protection and agriculture: Levels and trends in data [J]. Global Food Security, 2017(5): 94-107.

[64] Meng Lingsheng. Evaluating China ' 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3(1):1-11.

[65] Park Albert, Wang Sangui. Community - based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valuation of China ' s poor village investment program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0(9) : 790-799 .

[66] Rozelle Scott, Zhang Linxiu, Huang Jikun. Growth or Policy? Which is Winning China ' s War on Poverty [R]. Working Papers, 2002.

[67] Schwarcz Gyngyi. Ethnicizing poverty through social security provision in rural Hungary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2):99-107.